

# 耻辱者手記

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煎熬之中  
就是我们全人类的耻辱

摩罗◎著



贫乏的无法理解丰富的  
卑琐的无法理解伟大的  
而且，伟大的心灵永远是唯一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CHENHONG

# 耻辱者手記



摩罗◎著

I267.1  
M826-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耻辱者手记/摩罗著. —修订本.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14-06190-4

I. ①耻… II. ①摩…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0468号

- 书 名 耻辱者手记 (修订本)  
著 者 摩 罗  
责任编辑 蒋卫国  
特约编辑 赵晓慧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190-4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卷首题词

### 独行者语录

—

有一个人来友好我，又有一群人来友好我。我说：

“晚了！你们的世界是地狱，孤独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圣梯。让我孤独吧，因为我注定属于另一个世界。”

二

我在地上走，没有一处风景叫我留恋。我只是向着另一个所在疾走。

忽然有一群声音在叫我，是杨柳树下一群嬉戏的男女向我招呼，其中一位还走过来邀请我。

“不，请你不要走近我。”我立在路上冷然说，“我是为了与你们不同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讨厌一切烙上你们印记的东西，我甚至因了自己长有与你们相同的形貌而羞恼，因了自己的脚踩着同一片土地而惭愧。我唯有走向另一个世界，

才能实现与你们的不同。”

他们一时哑然。我一边前行，一边对他们说：“我们因为互相否定而彼此不同。但我是因为厌恶而否定你们，你们是因为不可理解而否定我。”

我又补充道：“我沿着你们的诅咒走向超越。心，因为不被理解而骄傲。”

### 三

一个诚实人拦住我，扬起瘦脸，用友善的声调说：“让我们谈谈吧，只要互相理解……”

我说：“麻木的无法理解热情的。”

“你所离弃的并不全是麻木的心灵。”

我说：“贫乏的无法理解丰富的，卑琐的无法理解伟大的。”

我说着撇开他继续赶路，并回过头来强调道：

“而且，伟大的心灵永远是唯一的。”

### 四

在沙洲上，有人问我这沙里有金吗。我说：“不要问我，我是一名过客。”

在荒漠的戈壁，有人问我驿路上有人吗。我说：“不要问我，我是一名过客。”

当城门口一名岗士要开口盘查我时，我不屑地说：“我不会进你们的城。凡你们的一切，我都嫌恶。凡跟你们有关的，我全要遗弃。我降生在这里，却不与你们同住。我的世界在别处。我只是这里的过客。”

### 五

村东头场子上。

人群中走出一名婀娜多姿的姑娘。她的容貌美丽自然，如银河边一棵纤尘不染的鲜花。她的眼睛水一样明澈深邃。

莫非我的道路就要终止在她的眸子里？

我一边寻思，一边恋看着她迷人的笑容。她回头看一眼人群，然后向我递来一束水仙花。

我终于摇摇头，平静地说：“我多么喜欢你，如果你不是长着与他们相同的样子。”我转过脸，向着前方迈步，同时说：

“可是再见吧，既然你是他们中的一个。”

## 六

越过许多城镇和乡村、江河和森林，我来到一片沙漠。我想坐下来片刻，忽然从沙丘那边冒出一个长着横眼睛、竖鼻子、宽嘴巴和两条腿的东西。他龇龇牙，亲热地说——

我们是同类……

立时有沉重的悲哀从我心上漫过。我遥远了我所嫌恶的一切，却没能遥远我所嫌恶的自身。我依然被这样的东西引为同类。我以他为镜子，察看着自己的丑陋，禁不住咬牙切齿地说——

我恶心！

狂风忽然激动起来，沙漠也不安宁了。我不再坐下休息，而是告别那个与我说话的东西，走向沙漠深处。我张开双臂，轻轻喊道——

让狂风淘洗我吧，让飞沙过滤我吧，让我在另一个世界的门口，变成另一个模样吧。除了人，我愿意是其他一切。

## 第一版序言

###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

钱理群

坦白地说，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摩罗的本名是什么；但我却要为他的“思想随笔”作序了。

第一次见到摩罗，我是有些惊异的：这样一个文静的书生，怎么竟然以“恶魔”自居，而且为文坛学界所认可？这一回，为写这篇序，通读了他的大部分文稿，又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引起了长远的思索与无尽的感慨。

我想起了世纪初鲁迅对“摩罗诗人”的呼唤——“摩罗”的笔名显然是源于此的。那时候，鲁迅正在殚精竭虑地寻找创建中国的“近世文明”的道路，“别立新宗”，即为中国在20世纪的变革提供新的理想与价值；为此，他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的理想，从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高举起了“个体精神自由”的旗帜。鲁迅认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之战士”，对于“理想在不撓”的中国传统的“不争之民”来说，他们无疑是异端的反叛者，但鲁迅看来，这正是其价值所在。因此，他引来了19世纪西方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以为同道，并且指明“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但鲁迅的呼唤，在世纪初的中国，竟是应者寥寥；他于是仰天长叹：“今索诸中国，精神

界之战士者安在？”（《摩罗诗力说》）……

但在荒原中毕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战士，而且在焦虑的期待中，陆续有了后继者，经历了五四直至抗战的千锤百炼，中国终于有了一个以鲁迅为先驱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但是，接着出现的，却是精神界战士被惩罚、被改造，以至导致肉体与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尽管对这悲剧产生的外在体制的，思想文化上的，以及中国知识者自身的根源，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但严酷的事实却是不可避免的：到了摩罗这一代，开始独立地面对世界，并要从前辈那里寻求精神资源时，他们所面临的，竟是一片精神废墟。正像摩罗在好几篇文章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尽管他对被权势树为敌人而历尽磨难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充满同情，但他从受难的态度中却并没有看到应有的反省与抗争，看到的却是已经渗入灵魂的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他甚至从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也或显或隐地看到了这样的顽症；这就意味着，不是个别人，而是整整几代知识分子，驯化，工具化了，而且至今也还没有引出必要的教训，以至他们中间少数觉醒者稍有反省，反而陷入孤立。这是真正的危机：苦难并没有转化为精神资源，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了。这样的发现，使摩罗惊恐不已；而当他把目光再转向世界，就更感到困惑：为什么处于同样（相近）的境遇下，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始终未断，唯独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改造（驯服）得如此全面，彻底，而且永不觉悟（还美其名为“永不反悔”）？这是怎样可怕的“中国国情”啊！而尤其让摩罗痛心的是，他竟然难以开口：因为——说出真相，就会打破某些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摩罗毕竟未经“改造”，血性尚在，勇气犹存，他奋笔直书，陆续写下收入本集中的《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等文，并且引起了舆论界的重视。而我却从他的这些文章里，重又听到了鲁迅当年“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呼唤，经过一个世纪的牺牲，这历史的重复（循环），更让人感到透骨的悲凉——我们真的有“一切从头开始”的力量与勇气吗？

而对摩罗这一代来说，也许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于他们自身的生存境遇。于



是，又有了摩罗自称的那个“干泣的黄昏”的“死亡体验”。这是同样惊心动魄的发现——

“我们一点也不懂得这是耻辱。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灵魂，完全没有自我。我们因为没有自我与灵魂，所以也没有了对于尊严的需要，没有了对于人的生活的需要。我们是没有需要的生灵，我们只需要一无所有，我们只配过一无所有的生活。”

“我们已经是非人，而且决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

“前面已经无路可走，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

“我真切地感到了灭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处飞逝。我无可挣扎地坠向耻辱的深渊。”（《咀嚼耻辱·非人的宿命》）

“我犹如大梦初醒。我扭着自己的头发，睁着恐惧的眼睛自责自问：我为什么曾经这样生活过？我为什么依然这样生活着？我还要这样生活下去吗？”（《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

这是对自己的非人的生存境遇、无以摆脱的精神死亡宿命的体验，这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也正是在这个“颤抖的黄昏”、“干泣的黄昏”，摩罗想起了鲁迅的“狂人”：“他知道自己是非人而对真的人怀着恐惧。他因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知道难见真的人”；并且引发了更为强烈的自责：“这种对于真的人的虔诚心哪里去了？这种对于自身非人状态的耻辱感哪里去了？”——摩罗终于在经历了自身的绝望的生存体验之后，与鲁迅相遇了。摩罗自己说他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独自发现了一个为我所独有的鲁迅”的；而在此之前，对教科书强制灌输那个“鲁迅”他是“怀疑且抗拒”的。而心灵的共振恰是表明了摩罗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鲁迅的传统：这自是意义重大的。

于是，摩罗又有了“光辉的（生存）体验”：那是类似于鲁迅（还有摩罗崇拜的孙中山）那样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准备着“战斗而且失败”的，“始终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起挣扎”的反抗意志与“行动、创造、实践”的欲望，以及“总感到前面有一种声音在呼唤”，因而永不停止追求的“过客”式的生命选择——摩罗因此说：“那个黄昏，是我今生的第一次死亡，同时也是我的第二次新生。”

而且很快就有了“孤独的痛苦”的体验。摩罗回忆说,他因为公开宣布了“我们都是非人”的发现,被视为“疯子”而遭驱逐(这几乎是重复了鲁迅笔下的“狂人”的遭遇)。他于是发现了自己的异端性,感受到了作为社会的叛徒(公敌)的孤独。由此激发起“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奴格区别开来”的强烈欲望:“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他于是点明:“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便是这番寓意”(《咀嚼耻辱·丑陋的中国文人》)。

摩罗就是这样通过自身的绝望体验、光辉体验与孤独体验,而一步步地向鲁迅所呼唤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欢愉”的精神界之战士靠拢。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这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因为那个“干泣的黄昏”不仅属于摩罗一个人,有那样一批年轻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世界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中的部分人,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绝望体验才真正认识与选择了鲁迅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种种思考;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纪末的绝望体验中,发现了鲁迅,而又不止于鲁迅(这是有别于我们这一代的)。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摩罗的写作就超越了他个人的表达,而具有了某种典型性,成为新一代青年中的杰出代表。

摩罗自己似乎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他在《知识分子的覆设》《思想随笔新三家》,以至《大作家刘震云》等文章中,谈到了“近年来”所出现的“自觉地寻找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自觉地趋近求道者形象”的努力。他接着又谈到了当人们“立志求道时,这才发现世界上竟没有一个自己所需要的道,这才发现我们的真实的处境,是如此地困窘,如此地危机四伏”:由此而激发了一代人的使命感,摩罗说:“一个时代所能意识到的危机,往往是从那些急需解决而且可能

解决的命题中产生的。也许，‘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真的到了一个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的关键年代？那裹挟我们几千年的巨大的历史惯性，真的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挣脱？”——或许，这也正是新一代的精神界战士所面临的时代使命？

“挣脱历史惯性，价值重建”，这自然是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思考与探索却必须从现在开始。摩罗正是将他自己前述刻骨铭心的体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思想命题。

读摩罗的思想随笔，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他最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耻辱”：这几乎成了永远压在他心上的梦魇，以至形成了摆脱不掉的心理情结；他因此而提出了“咀嚼耻辱，描述耻辱”的思想命题，并以此作为他自己与同代人觉醒的起点。所谓“耻辱”即是前文所引述的，既身处于“非人”的地位，却毫无自觉，甚至百般回避与掩饰，这也是鲁迅所说的：“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的奴才心态，众多的国民（包括文人）麻木于此，摩罗却以为奇耻大辱。因此，所谓“咀嚼耻辱”，即是走出麻木状态，摆脱奴才心理，正视苦难，直面耻辱，这是第一步。“咀嚼耻辱”也是人性尊严恢复的过程，而唯有以“人”的身份、心理、尊严去反观苦难，这才能达到对苦难的理性的“反思”，自觉的“反抗”。这就是摩罗所说的，“仅仅懂得（正视）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因子。只有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难。”反思也有不同层次。摩罗说：“苦难总是由每一个受难者分别承担的。只有耻辱才可使人类沟通。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苦难，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罪恶，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这就是说，必须把个体的苦难，国家、民族的苦难，上升到人类共同苦难的高度，反思才能超越于一己经验局限，达到更为普遍的层次，获得理论的深度与思想、精神境界的升华，所谓“咀嚼耻辱”正是包含了“正视，反思与升华”这三个层面；唯有如此，人们所经受的苦难与耻辱才能真正转化为精神的资源。而摩罗更是期待着，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在“咀嚼耻辱”过程中，“重新审视与确认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建立起自身的“确定的体验”，即对人的非人化的高度敏感基础上的“深重的耻辱感”；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稳定的性格”（按

摩罗的解释，这种性格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在文化理想与精神信念上所具有的稳定的思想立场、精神品格），“重新规划与建立自我与世界的秩序”，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对奴役人的一切形态的抗争，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摩罗所说的“描述耻辱”所指的也正是建立在自身“确定的体验”与“稳定的性格”基础上，从自己内心找到的，属于自己的言说内容与方式。

摩罗，以及他的同伴，正是以这样的姿态与方式，发言了。

首先要“追问前提”（这也是摩罗的命题），即对长期支配着人们（首先是自己）行为的，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因而无须（也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观念提出挑战，追问其合理性。他问：“人究竟该为尊严活着，还是该为使命活着？”（《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他又问：“倘若一个生命的最高意义就是为国家牺牲自己，那这样的国家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合道的还是非道的？是合德的还是非德的？是该享祭的还是该献祭的？”（《什么是写作》）如摩罗自己所说，这是“从理所当然中看出荒谬，从司空见惯中感到惊讶”，这也是“重新估定价值”，要走出被神圣化了的虚妄，但却要触犯制造虚妄、并使其神圣化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会触怒习惯于虚妄，精神麻木的多数。因此，这觉醒者的追问，便先天地带有悲怆的意味，这是我们在读摩罗的文章时，可以时时感受到的。

所谓虚妄就因为违背常识（常理），“追问前提”其实就是要“回到常识”，摩罗干脆把他（以及朋友们）要做的事，归结为“言说常识，宣示常识”。这又是一个摩罗的命题，说的是大实话，却让人备感悲凉。因为我们今天（或者说半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始终是“常识的沦丧”，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牺牲了那么多的人，都是源于忘了常识，或有意地抛开常识，去另立什么违背常识的“真理”。当年的鲁迅，如今的摩罗们，费尽口舌，说的尽是常识。比如，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革命是要人活，而不是要人死。”（鲁迅语）等等；比如，“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摩罗：《咀嚼耻辱·反叛非人》）等等。理论家或许会认为这些观点毫无新意，且已落后，不够“先锋”，更可以列举各种更为高明的新说。这些我都相信，但我认定的却是一条：这些常识在中国真正落实，还会有诸多阻力，还要费很大的劲。只要现状

如此，摩罗的“言说常识，宣示常识”的命题就始终有意义。而且我相信摩罗的话：这仍然需要“人格力量，道德勇气”，“认识了常识并且说出常识，与认识了常识而说不出常识，二者的区别决不在于说与不说，而在于人格境界和精神自由上有天壤之异”。也还是摩罗说的好：“在自由的时代，每一条常识都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可在某些特殊的状况中，由于常识和事实本身一样令人恐惧，说出常识往往成为一种壮举。透过微弱的呢喃，我感到一个强大的自我正在悄悄生长。这个自我不想淹没于外部世界之中，而是要超越于外部世界之上。”

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新一代的“强大的自我”，他们热切地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同样热切地追求全人类的物质幸福与精神自由——他们早已宣布，“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的耻辱”，“爱一切苦难的生灵，并和他们一起解除生存的煎熬”，这是“唯一的选择”。作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他们已经认定要与一切奴役人（使人非人化）的制度、思想、观念作不妥协的反抗，他们深知自己所追求的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层的人性的需要与历史的需要”，因此时刻准备着“战斗后的失败”，并且正在磨炼自己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承受力。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弱点与不成熟之处，但正是他们自己在时刻无情地批判与反省着自己。在我看来，他们的真正力量与希望也正在这里——我从摩罗的思想随笔中看到了这一切，自是感到十分的欣慰。我知道，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在作着不同于摩罗们的选择，也自有自己的价值。在这世纪之末，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在经历了大绝望以后，又在进行新的思考，新的追求，新的探索，或者说，他们正在“从头开始”。对此，应该给予关注，给予支持，这是我们这些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挫折，并已无力重新来过，又仍对未来中国与世界抱有希望的年长者，所应做与可做的“最后的工作”——我因此而欣然为摩罗的第一本文集作序。

1998年8月30日深夜12时写毕于燕北园

### 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

摩 罗

#### 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有多远？

1998年，《耻辱者手记》刚刚出版，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颇出我的意料。往后的几年，常有朋友向我打听，哪里能买到《耻辱者手记》。有时候在社交场合，我会遇到某位年轻朋友，很隆重地向我表示感谢，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耻辱者手记》曾是他最重要的启蒙读物之一。

在出版销售的第一波热潮过去之后，我对这本书就慢慢冷静下来。后来遇到读者朋友的称道，我也常常颇为忐忑。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所给予读者的东西太少了，真正是“卑之无甚高论”啊。去年初，在南昌的一家酒店里，几位老朋友依然在表示对《耻辱者手记》的厚爱。北行的火车启动以后，我向这几位刚刚在候车室里跟我挥手告别的朋友发短信致谢，其中一位朋友在回复短信时再一次强调，你怎么敢那么轻慢地谈论《耻辱者手记》，那本书处处都在张扬屈辱者的尊严，那是一种抗争者的尊严。

关于《耻辱者手记》，十年来这是最为打动我的一句评价。我没有回复这条短信，我感到也许我真得好好想想《耻辱者手记》的价值。这一年我一边写作一边不紧不慢地琢磨着那位朋友的意见。

最近《中国站起来》的出版，让我再一次集中思考《耻辱者手记》的内容与主旨。《中国站起来》虽然受到一些新读者的欢迎和称赞，却遭到《耻辱者手记》许多老读者的抵制。网上和报刊上批评《中国站起来》的，绝大多数都是用《耻辱者手记》压《中国站起来》。他们的基本句法是：《耻辱者手记》的作者演变为《中国站起来》的作者，摩罗已经堕落了。

为什么在我自己看来十分自然的思想发展，在读者和媒体看来却如此突兀，竟至于被一些报刊描述为“今天的摩罗在虐杀昨天的摩罗”、“摩罗清算摩罗”？《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与《耻辱者手记》的作者之间，究竟横亘着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最近13年来，我的知识和认识，究竟增加了一些什么？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述，这些年我做了一件事，补充了一种知识，有了一个发现。

一件事：我选择江西丘陵地区、河北平原地区、内蒙古黄土高原地区等三个不同地区，对那里的乡村文化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既是中国的底层，也是全世界的底层。我的调查完全是参与性的，在他们祭祀祖先的活动中，我是祭祀者而不是访问者。在他们隆重的葬礼上，我是戴着孝花跪在地上对陌生死者行大礼、并到礼簿上登记礼金的凭吊者，而不是外来的旁观者。

我完全沉浸在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之中，充分理解这种文化和持守这种文化的底层社会的正当性。所谓愚昧，所谓迷信，不过是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的人出于傲慢与政治需要，对他们所作的主观描述。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通过对底层文化正当性的否定，必然地通向了对他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漠视与否定。

一种知识：我在阅读人类学著作时，从英国学者达尔文和普里查德的文字中，发现了西方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屠杀的蛛丝马迹。我觉得这是我了解人性、了解西方种族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我马上中止了人类学的学习，转而研究起殖民史来。这是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所看到的東西，跟中国学者称道林则徐睁眼看世界所关注的东西大不一样，跟五四一代建构的世界图式更是有天壤之别。

以前阅读中国近代史时，对西方在中国的殖民表现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像与

我同龄或长我一轮的许多中国读书人一样，将制造那些悲惨故事的责任都推给腐败的满清政权和愚昧的义和团，极力维护西方侵略者作为文明传播者和现代化推进者的正当性。可是，当我读到西方人在美洲、澳洲、非洲、印度进行掠夺和屠杀时，已经无法以满清和义和团作为替罪羊敷衍过去。这个契机让我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性以及西方种族的性格，能够重新打量和认识。

也就是说，我上学以来所学的所有历史知识，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不得不进行一次重组，以前的知识给我建构的世界图式，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换句话说，以前我心中的世界图式，是由五四启蒙话语和 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话语所塑造的，我跟 8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读书人具有相同的世界图式。现在，我心中的世界图式是在殖民史知识介入之后重新生成的，它在我的同龄人中可能不是主流，甚至可能是异端。

一个发现：非洲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一个非洲人说，西方殖民者来到非洲的时候，土地在我们手里，《圣经》在他们手里。一百年后我们发现，《圣经》在我们手里，土地在他们手里。

这个故事高度概括了我这几年的相同发现。西方殖民史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 1492 年哥伦布侵占美洲土地为开端，直到二战结束。第二时期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第一时期他们输出的是《圣经》和上帝，收回的是无穷无尽的金银财宝，第二时期他们输出的是普世价值，收回的是财富、屈服和服务。

500 年来地球上的文化传播和财富流向呈现出十足的逆向运动态势，谁能够借助枪炮的力量输出文化，谁就能够坐享文化接受地送来的财富和服务；谁若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别人的文化，谁就必定会同样心悦诚服地将自己的财富奉送给那些文化的母国。

所以，那些殖民国家不只是擅长于用枪杆子统治世界，同样擅长于用自己的文化统治世界。

以上都是铺垫，现在我来说说我的卑之无甚高论的“一个发现”。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诸多民族、诸多阶级的紧张关系中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这个文化



的目的就是用文化维护自己这个群体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所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将自己民族的利益置于文化的中心，并极力将其他民族的存在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之中。一个阶级也是这样。

### 《中国站起来》与《耻辱者手记》神髓相通

由上文推出的下一个所以就是：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传播推广自己文化的过程，就是将其他民族、其他阶级纳入到自己的利益框架中的过程。中国的帝王将相为什么两千年如一日地积极推广儒家文化？这个教化的过程就是为了将其他阶级都纳入到权贵阶级的利益框架之中。经过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和毛泽东时代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国的读书人对我以上的判断一般都能接受，《耻辱者手记》跟这种判断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西方殖民者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推广他们的上帝和普世价值，并居高临下地批判其他国家的“国民劣根性”？目的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全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都组织到他们的利益框架之中。《中国站起来》就是为了揭穿这个事实、表达这个判断而写的。这个判断在中国知识界必将遭遇抵触，《中国站起来》当然也必会受到围剿。

为什么这个判断在中国知识界会遭遇抵触呢？因为这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借助五四启蒙运动或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资源成长起来的，而那两个资源所建构的世界图式，都高度肯定西方殖民者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传播上帝福音和普世价值方面的道德形象，这种肯定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另一种罪恶的后果，那就是隐晦地认可他们殖民的正当性和掠夺与屠杀的正当性。

《中国站起来》打破了那个虚妄的世界图式，批判了西方殖民的罪恶，站在弱势国家的立场对今天依然猖獗的新的殖民形式及其相关霸权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尤其是，对百余年来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化，以及借助这种文化立场对于中国社会的居高临下的描述和命名，表现出不信任、不认可、不接受的姿态。我的